

韩柳文法祖《史记》研究

俞樟华 虞芳芳◎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韩柳文法祖《史记》研究

俞樟华 虞芳芳◎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柳文法祖《史记》研究 / 俞樟华, 虞芳芳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207-11088-6

I. ①韩… II. ①俞…②虞… III. ①《史记》—研
究 IV. 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5060 号

责任编辑:孙国志

封面设计:张 涛

责任校对:秋云平

韩柳文法祖《史记》研究

俞樟华 虞芳芳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11088-6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51) 823080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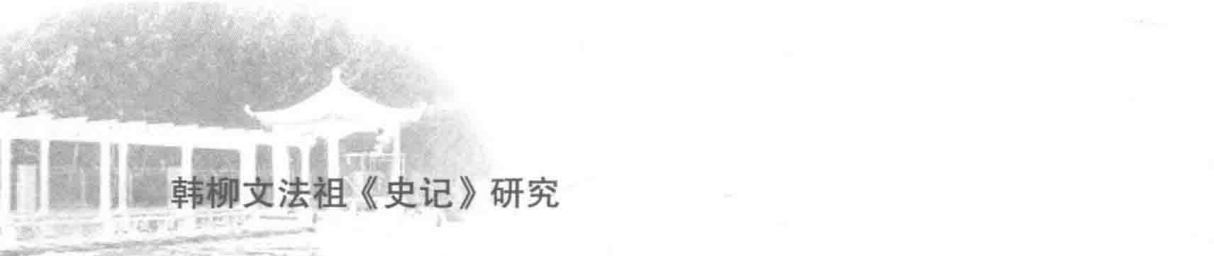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前 言

司马迁的《史记》作为古代史传文学的典范作品,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最直接的是散文。从唐宋八大家到明代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再到清代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首的桐城派,上下千余年的大大小小的古文家,都是高举学习《史记》的旗帜,以能写出司马迁那样的文章为荣的。不仅许多古文家一再表示自己是师法马、班的,而且后代的文章批评家也始终以马、班的文章作为衡量古文高低的唯一标准,那些深受历代文章家好评的作品,都是师法马、班最到家的作品。总结一下古代文章家在这方面的批评材料,可以看到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作品对古代散文的巨大影响。

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著名领袖、杰出的散文家,他们都十分推崇司马迁,十分爱好《史记》。柳宗元是韩愈的朋友,他最了解韩愈的为人和文章,当时他就在《答韦珩示韩愈推以文墨事书》中说过:“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韩愈自己也在《答刘正夫书》中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所以他作文,“上规姚姒,浑浑无涯,下逮庄、骚、太史所录”(《进学解》),非常注意从《庄子》《史记》等书中汲取文学滋养。在《答李翊书》中,韩愈自述其学文经过时又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金代刘壎认为,所谓三代只是一句虚话,重点是学两汉,而两汉文章的代表不出《史记》和《汉书》,所以,韩愈主要侧重学习马、班文章的特点,他自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那么,韩愈文章从司马迁那里究竟学到了哪些东西呢?按照古人的理解,主要有下面几点:

其一,“太史公文,韩得其雄”。这是清代文学批评家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的。司马迁的文章,有的如浑浩的长江大河,雄奇奔放,豪迈不羁,表现出一种阳刚之美;有的却像微波荡漾的清池曲水,委婉曲折,平易自



韩柳文法祖《史记》研究

然,偏于阴柔之美。在史传文学研究史上,第一个用“雄深雅健”的评语来概括司马迁文章风格的是韩愈。这个概括是很准确的,司马迁笔力劲健,感情充沛,文势或大起大落,跌宕有致,或如江河浪涛,滚滚而来,汹涌不绝,给人以雄放疏荡、颇有奇气之感。韩愈的文章也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具有一种宏伟奔放、刚健奇诡的独特风格,所以后人把他这种文风的得来与司马迁紧密联系了起来。白居易就在《韩愈比部郎中央馆修撰制》一文中说过:“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文之雄健,全在气势。为了使文章气势旺盛,韩愈和司马迁一样,非常注意表现方法的多样化。一是多用排比句。排比句的好处是把同范围、同性质的事物以结构相同或相类的语句连接在一起来讲,层层深入,步步逼近,仿佛长江后浪接前浪,给人以滔滔不绝的壮观。《史记》和韩文用排比句加强气势的例子之多,人所共知,毋庸赘举。二是大量运用虚词。清代古文家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至孔子之时,虚字详备,作者神态毕出。《左氏》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至先秦战国,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惟子长集其大成。”这是说,自先秦以来,司马迁是最善于运用虚词写作的作家。继司马迁之后,则韩愈最擅长此道。他为了使文势高悬,也大量使用虚词,如《祭十二郎文》《与崔群书》等篇,都是因为多用虚词而情深气沛、摇曳生姿、动人心肺的。宋代费衎《梁溪漫志》卷六曾说:“退之《祭十二郎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词。其最妙处,自‘其信然耶’以下,至‘几何不从汝而死也’一段,仅三十句,凡句尾连用‘耶’字者三,连用‘乎’字者三,连用‘也’字者四,连用‘矣’字者七,几于句句用助词矣!而反复出没,如怒涛惊湍,变化不测,非妙于文章者,安能及此!”三是发端突兀,似横空出世,先声夺人。归有光论《史记》,谓司马迁的文章“起头处来得勇猛”;近代李景星《史记评议》具体地说,《史记·西南夷列传》“传之起首如青山霹雳,如平地奇峰,突兀得势,入后步步照应,有破竹之妙。”韩文也工于发端,魏禧《日录论文》就说:“韩文入手多特起,故雄奇有力”;而刘熙载则说:“韩得史公之雄,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他们都指出,韩愈文章善于发端见奇,制造声势的特点,与司马迁颇多师承关系。

其二,“韩、柳文法祖《史记》”。这是宋代吴子良在《林下偶谈》中首先

提出来的。我们先看韩愈文法祖《史记》的情况。吴子良说：“退之《获麟解》云：‘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句法盖祖《史记·老子传》云：‘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鱼吾知其能游。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比较这两短话的句法，真是完全一样。而且这不是个别现象，在韩文中随手还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如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九说，韩愈《祭薛助教》中“有‘后三月’，此用《史记》‘后九月’文法也。”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五也说韩愈在《薛公达墓志》一文中所谓“凤翔军帅设的命射，君三发，连三中。中，辄一军大呼以笑，连三大呼笑”与《史记》写陈平“从攻陈豨、黥布，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的笔法完全一致。金元时期的刘壎也在《隐居通议》卷十八说，韩愈的碑铭，“妙处实本太史公也，第此老稍能自秘，示人以高，故未尝尊称迁、固。至其平生受用，则实得于此。此亦文章士之私意小智也。公尝自泄其机矣，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所谓两汉，非班、马邪？《史记》云‘胜不敢复相士’云云，‘胜不敢复相士’；韩碑云‘汝何敢反’云云，‘汝何敢反’。《史记·荆轲传》云：‘轲真倾危之士哉’。韩《毛颖传》：‘秦真少恩哉’。班孟坚《东方朔传》云：‘奈何乎陛下’。韩铭云：‘奈何乎公’。若此者，殆不胜纪。然则世之工作文者，固不得舍《史》《汉》而他求也。流俗无特见，随声附和，以韩文为一出于经，误矣！”清代曾国藩也说，韩愈《读荀子》一文中的“孔子删《诗》《书》，笔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离于道者黜去之。故《诗》《书》《春秋》无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欤”等语，“衿慎之至，一字不苟，文气类史公《年表序》。”（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二引）元代程端礼说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字数不多，文法妙似《史记》。”（《昌黎文式》卷四）清代储欣也说这篇文章的“‘古’‘今’二意是关键；‘吾知’‘吾恶知’是俯仰呼应处。深意顿挫，字字司马论赞风神。”（《唐宋八大家类选》卷一〇）李某曰：此文“末段托意高妙，措辞深婉，文境颇近司马子长。”刘大櫆则认为此文“微情妙旨，寄之笔墨之外，昌黎平生作文，不欲托《史记》篱下，独此为近。”吴汝纶在评论韩愈的《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时也说：“凡文字以意在言外，委婉不尽，为最上乘。《左氏传》最为擅场，《史

韩柳文法祖《史记》研究

记》亦数数见之，韩文中类此者，盖可指数。自余各家，于此微旨寥乎绝矣。”（以上均引自《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二）这些事例说明，韩愈文法祖《史记》的话，不是一句虚言。

其三，人物传记得“龙门神髓”。在写人叙事上，韩愈也非常重视向《史记》学习，而且学得很有成就。如他的《张中丞传后叙》不仅在体例上沿用《史记》传后论体笔法，就有关《张巡传》的内容发表议论并补充一些自己采访到的史料，而且在刻画张巡和南霁云的手法上，与《史记》就很相似。此文写人叙事最生动的是有关南霁云向贺兰求救的那一段：“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从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气质，这样的口吻，这样的举动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项羽、樊哙、李广等人的影子。所以古代评论家都认为此文作为韩愈传记作品的代表作，是深受司马迁影响的。清代吴闿生在评论南霁云拔箭射砖发誓这段描写时曾说：“加入此层，神态愈觉超逸，此颊上添毫之笔，乃生气之溢出者。文章死活高下，全争此等，《左传》中此境独多，《史记》亦往往有之，唐以后则殆绝矣。韩公之文所以振起八代，有生龙活虎之精神者，以此也。”这是对韩文描写人物片断的评论。就整篇传记而言，茅坤甚至认为：“通篇句、字、气，皆太史公髓，非昌黎本色。”方苞则曰：“退之叙事文不学《史记》，而生气奋动处不觉与之相近。”（以上均引自《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二《张中丞传后叙》引）清代乾隆皇帝对《张中丞传后叙》也特别欣赏，肯定它“叙致曲折如画，真得龙门神髓，非徒形似也。”（《唐宋文醇》卷一引）韩愈写人常常能将人物写得虎虎有生气，在这一点上，与司马迁往往有异曲同工之妙。韩愈的《毛颖传》不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传记，它的传主不是人，而是一支毛笔，但在立意和写法上，却与司马迁的传记文章有着密切的师承关系。李肇《国史补》卷下说：“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这是总体评价。具体而

言,汪某说,文章开端“先旁叙,亦得《史记》叙世次法”。李某也说,文章先叙毛颖的先世,“犹史传中之叙述世次,其用笔之疏宕,叙事之简洁,不让史公”。中间写毛颖的性情和才能,又“犹史传中之撮举行能,行文纵横恣肆,不可羁勒,然却无语不精,无字不切,所以为妙。”文末对毛颖“以老见疏”那种不幸遭遇“感喟无端,顿挫有节,尤为史公神境”。茅坤也对文章结尾的描写大加赞叹,说韩愈“设虚景摹写,工极古今,其连翩跌宕,刻画司马子长”。(《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二《毛颖传》引)再如韩愈的《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与一般的墓志铭写法完全不同,作者打破常规,刻意写了一段王适设计骗娶妻子的轶事,其云:“初,处士将嫁其女,怨曰:‘吾以龃齬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指王适)曰:‘吾求妇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漫谓媒妁:‘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妣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耶?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妣曰:‘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视,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在墓志铭中写这样的事情,又写得如此曲折生动,引人入胜,让人好像是在读小说一样,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写法。因为它违反了墓志铭写作的常规,所以曾遭到一些非议,曾国藩在《求阙斋读书录》中就指责说:“此等文已失古意”,“末流效之,乃堕恶趣矣”。这当然是一种保守的观念。后人也有欣赏这种写法的,如汪某就说:司马迁在“《司马相如传》详叙文君事,则此载娶妇事何妨?”意思是说,司马迁可以在《史记》中详细描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的故事,并没有遭人非议,那么,韩愈在王适的墓志铭中写他骗娶妻子的轶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此论不仅点出了韩愈这种写法的师承来历,而且对韩愈把史传文学的一些笔法运用到墓志铭写作中来的做法表示赞赏、肯定,这比曾国藩要开明通达多了。正因为韩愈把史传文学的笔法运用到了墓志铭的写作之中,所以他那些写得好的墓志铭,就有了传记文学价值,赢得了后人的好评。

柳宗元是与韩愈并驾齐驱的古文家,他也是非常推崇司马迁和《史记》的。他在《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中说:“当文帝时,始得贾生,明儒术;而武帝尤好焉,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接着在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谈到自己写文章的体会时又说：“参之《穀梁传》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又说：“《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柳宗元的文章以“峻洁”著称，据他自己说，这种风格是从《史记》中学来的。这应该是最直接，也是最准确的说明。除了柳宗元自己以外，对他了解最深的韩愈也曾说过，柳宗元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引）我们今天从他的创作实践看，其文章从内容到形式的确都继承了《史记》中不少优秀的东西，对此，前人早有认识和评论。朱熹说：“柳子厚文有所模仿者极精，如《自解》诸书，是仿司马迁《与任安书》。”（《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李绂《与方灵皋论所评柳文书》说，柳宗元的“书序论记，散体大篇，则辞气雄深雅健，诚如昌黎所云，足以追马配韩，卓然而不愧也。”茅坤也说，《与许京兆孟容书》是“子厚最失意时书，却写得最得意，直可与太史公《与任安书》相参，而气则呜咽萧飒矣。”（《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茅坤认为，柳宗元在遭贬永州以后所写的书信，其感情风格与司马迁受李陵之祸而写的《报任安书》极为相似。方苞对此不甚同意，他认为：“子厚在贬所寄诸故人书，事本丛细，情虽幽苦，而与自反而无怍者异，故不觉其气之蜚。相其风格，不过与嵇叔夜《绝山巨源书》相近耳。而鹿门以拟太史公《报任安书》，是未察其形，并未辨其貌也。”姚鼐则对茅坤和方苞的批评都不太满意，认为：“子厚永州与诸故人书，茅顺甫比之司马子长、韩退之，诚为不逮远甚，而方侍郎遽云相其风格，不过如《与山巨源绝交书》，则评亦失公矣。子厚气格紧健，自有得于古人。若叔夜文虽有韵致，而轻弱不出魏、晋文格。如子厚山水记，间用《水经注》兴象，然子厚岂郦道元所能逮耶？”刘大櫆的意见又与姚鼐不一样，他说：“子厚寄许（孟容）、萧（俛）、李（建）三书，未尝不自《报任安》来，但史公刑不当罪，故悲愤而其气豪壮；子厚自反不缩，故气象衰飒，然撰造苦语绝工，足以动人衿闵。鹿门比之胡笳塞曲，褒贬极当。”（以上均引自《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四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注）柳宗元和司马迁都有过一段极其不幸的遭遇，发之为文必然沉痛悲愤，在这一点上，柳宗元在永州所写的许多书信，确

实与司马迁《报任安书》的风格有不少相同之处,说它受到了司马迁的某些影响,自然是有根据的。方苞完全否定这点,是不够明智的,难怪姚、刘两人都不同意。但他们三人都看到柳宗元这类文章在气象或气格上都不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也是有识之言。不独风格相似,在文法上,柳宗元也和韩愈一样,也是师法司马迁的《史记》的。王应麟、吴子良等人就认为,柳宗元的《游黄溪记》的文法是模仿《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试比较一下,司马迁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柳宗元云:“北之晋,西适幽,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泂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这两段话在介绍地理方位时所用的方法和语言,确实非常一致,师法的痕迹是极为明显的。所以后来近代学者李景星也有“韩退之、柳柳州、白乐天最喜仿”《西南夷列传》的写法的评论。

韩愈和柳宗元为什么都如此重视学习《史记》呢?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做过如下分析:“六朝骈丽,为人志铭,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开辟蓁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师。”(《文史通义·外篇二》)可见韩、柳努力取法于《史记》,本是为了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以复古的名义开创一种新文风,倡导一种新文体,由于他们不是机械模仿,全盘因袭,而是在学习中有创造发明,能自成一家,所以他们取得的成就非常巨大,他们自己也成了继马、班以后的最杰出的古文家,成了后代古文家师法学习的榜样。韩、柳是《史记》文章艺术的最好继承者,是继司马迁之后的最优秀的散文家,这是古往今来的评论家一致公认的看法。韩、柳对《史记》的大力推崇和学习,不仅使他们自己受益匪浅,而且还直接推动和影响了当时和后代古文家对《史记》的研习。在唐代,除了韩愈和柳宗元以外,继承史传文学笔法的古文家还有不少。如张道济的《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文中有云,卢思道“凡更臣三代,易官十七,再降,一免;二去职,八平除,擢迁者四而已。”高步瀛对这几句描写评论说:“总括数语以收束前半篇,此法出自《史记·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樊哙列传》等。”(《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一)李翱是韩愈的高足,



韩柳文法祖《史记》研究

其散文创作在当时也很有名气。他的文章师法司马迁的地方也随处可见。如他的《题燕太子丹传后》一文,储欣就认为其中对燕太子丹的描写,是“摹子长”,即追摹司马迁的;吴汝纶也说这篇文章在写法上几乎“笔笔转,句句变,皆从空中折换,极顿挫反侧之势。是太史公神妙之境,不易到也。”(《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五引)

司马迁的《史记》到了宋代,获得了更大的好评和更广泛地师法学习。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出现在宋代,他们是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这六位杰出的古文家与韩、柳一样,都是非常推崇《史记》,并努力师法《史记》的。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也是著名的史学家。他的《新五代史》得力于《史记》甚多,被后人认为是历代史传作品中学《史记》学得最好的,如罗大经《鹤林玉露》就说其书可以“与司马子长并驾”,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也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尤其是《新五代史》中的《伶官传序》,简直就是司马迁的手笔,沈德潜说它“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一四);林西仲说它“其行文悲壮淋漓,可与子长、孟坚颉颃”(《古文笔法百篇》引)。当然,作为古文家,欧阳修的突出成就还是在散文方面。苏洵说他的文章“纤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而欧阳修那种纤余委备、自然流畅的风格,正是从《史记》发展而来的。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曾指出,太史公文,“欧得其逸”,“逸者善用纤徐,故引绪乃觐入妙”。这个评论是完全正确的。欧阳修的散文是很用心学习《史记》的,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说他“记事似司马迁”;方苞《古文约选序例》说他的碑志铭“摹《史记》之格调,而得其风神”;又说“欧公志诸朋好,悲思激宕,风格最近太史公”。这是笼统而言,具体地说,茅坤认为欧阳修的《释秘演诗集序》一文“多慷慨呜咽之音,命意最旷而逸,得司马子长之神髓矣”;张廉卿也说此文“直起直落,直转直接,具无穷变化,纯是潜气内转,可与子长诸表序参看”。张廉卿还指出,欧阳修的《胡先生墓表》记胡瑗在太学中的言谈举止所用的笔法,是“从《史记》李广、程不识一段化出”来的。刘大櫆则认为“欧公叙事之文,独得史迁风神,此篇(指《黄梦升墓志铭》)遒宕古逸,当为墓志第一”。(《以上均引自《唐宋

文举要》甲编卷六)所以明代的艾南英遂将欧阳修与司马迁、韩愈并称为古文三大家,还盛推欧阳修为《史记》之嫡子,即司马迁最好最理想的衣钵传人。他在《与友人论文书二》说:“千古文章,独一史迁。史迁而后,千有余年,能存史迁之神者,独一欧公。”他还指出,归有光曾“留心《史记》,摹神、摹境,假道于欧。欧者,《史记》之嫡子,而此老则欧之高足也。”艾南英把欧阳修作为唯一一位能得司马迁之神髓的人来评价,这尽管有点把古文弄得过于偏狭之嫌,但是它至少可以说明,欧阳修确实实是受到了司马迁的深刻而又重大的影响的。这还不够,艾南英认为欧阳修之所以成为一代名家,他是兼收并蓄,包容百家的,他在《与年家子温伯芳书》中指出:“文章大家,亦复无所不有方为大家。古文中惟欧公足当之。欧公有《史记》文,有韩文,有柳文,又有六朝韩文,而亦自具宋时同时之文,如苏、如王、如李纲奏议,皆若于欧集见之,此所以为大家也。诸史中惟《史记》可称大家。《史记》有极简老文,有极波澜浩渺文,有极整齐严核文,又有极疏节阔目文,此所谓大家也。时文亦然,时文惟守溪先生无所不有,次则震川、荆川,有欧,有曾,有苏,有极简老文字,又有极轻婉文字,有高文典册,又有曲折疏宕,然此非可语与今日之人也。”在明代持这种观点的还有茅坤,他在《与唐凝庵礼部书》中说:“太史公没,上下千余年间,所得太史公序事之文之髓者,惟欧阳子也。”他在《欧阳文忠公文抄引》中又说:“西京以来,独称太史公迁,以其驰骤跌宕,悲慨呜咽,而风神所注,往往于点缀指次外独得妙解。……累数百年而得韩昌黎,然彼固别开门户也。又三百年而得欧阳子。……予所以独爱其文,妄谓世之文人学士得太史公之遗者,独欧阳子一人而已。”明人一般都是欧阳修与曾巩并提,认为他俩都能得太史公之神,可是艾南英和茅坤却觉得曾巩“木讷蹇涩”,在唐宋八大家中才能最低,根本无法与欧阳修相提并论,所以他们一致推崇欧阳修,认为他是能得太史公文章之神髓的第一人。欧阳修除了叙事风格酷似太史公笔法之外,他的人物传记也是很注意潜心学习《史记》的。他在写《桑怿传》时曾对此做了专门说明:“余固喜传人事,尤爱司马迁善传,而其所书皆伟烈奇节士,喜读之,欲学其作,而怪今人如迁所书者何少也!乃疑迁特雄文善壮其说,而古人未必然也。乃得桑怿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迁书不诬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尽知也。怿所为壮矣,而

不知予文能如迁书使人读而喜否?”在这里,欧阳修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很爱好司马迁的人物传记作品,不仅喜读不厌,而且“欲学其作”,《桑怿传》正是“欲学其作”的产物之一。虽然他表面上谦虚地说自己的作品不一定会像司马迁的作品那样深受读者的喜欢,可实际上他的本意却是在说自己的传记作品因为模仿司马迁写人物的手法比较到家,所以读者是可以像喜欢《史记》人物传记一样来喜欢它的,谦虚中含有自负和自信。事实也真是这样,《桑怿传》是欧阳修写得最细腻具体的一篇人物传记,在写法上确实受司马迁的影响很深。司马迁写人物,每篇总是先确定一个主题,然后根据这个主题需要去选择和组织材料。对于那些不利于表现主题,或有损于人物形象完整性的其他史实,他或者忍痛舍弃,只字不提;或者放到与之有关的人物传记中去加以叙述,互为补充。他写魏公子,写田单,写项羽等人,都是如此。这是一种突出重点不及其余的写人方法,欧阳修写《桑怿传》所用的正是这种方法。传文以桑怿捕盗为中心组织材料,通过桑怿智擒盗墓者、入深山招抚占山为盗的王伯、化装捕捉二十三名惯盗,以及功成而不赏等几个生动奇特的情节故事,塑造了一个智勇双全、品行高节的神捕形象,具有强烈的艺术吸引力。为了突出中心,欧阳修甚至连桑怿在抵抗西夏战斗中为国捐躯这样壮烈的事迹也没有写。这种做法,显然是继承了司马迁的写人风格。

欧阳修师法司马迁,不仅自己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影响了当时的古文家。曾巩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他为文也远宗司马迁、韩愈,近学欧阳修,一时文名极盛。《宋史》本传说他的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曾巩对司马迁和《史记》一向都是很重视的,这从宋人王正德《余师录》所记的一则轶事中可见一斑:“陈后山初携文卷见南丰先生,先生览之,问曰:‘曾读《史记》否?’后山对曰:‘自幼年即读之矣。’南丰曰:‘不然,要当且置它书,熟读《史记》三两年尔。’后山如南丰之言,读之,后再以文卷见南丰,南丰曰:‘如是足也。’”陈师道自幼即读《史记》,对《史记》不可谓不熟,曾巩还要他放弃它书,再专心致志地攻读《史记》两三年,直到心领神会,写出近似司马迁《史记》那样的文章后,才心满意足,予以肯定。从这则故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曾巩对《史

记》的极大重视和注意学习,而且可以看到宋代其他古文家对《史记》的殷勤师法学习。

至于三苏与《史记》的关系和所受到的深刻影响,就更需要重点梳理一下,这里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三苏评《史记》。评论《史记》的风气,始于宋而盛于明清。三苏没有专门的《史记》辑评本,他们对《史记》的评论,主要散见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文字虽非长篇大论,但真知灼见时见乎篇,不少评论发人所未发,在当时及后世都很有影响。如苏洵认为《史记》有四个特点:对前两点,他是这样分析的:

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阼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酈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夫颇、食其皆功十而过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颇,辩如酈食其,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也隐而彰乎?

迁论苏秦,称其智过人,不使独蒙恶声;论北宫伯子,多其爱人长者。夫秦、伯子皆过十而功一者也,苟举十以废一,后之人必曰:“苏秦、北宫伯子虽有善不录矣,吾复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坚其肆恶之志也,故于传详之,于论于赞复明之,则其惩恶也,不也直而宽乎!

所谓“隐而彰”,是指对于“功十而过一”的人,本传记其功,对其过则“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这样既做到了“实录”,又达到了褒善的目的。所谓“直而宽”,是指对于“过十而功一”的人,本传不仅要记其过,而且要详记其“一功”。这样既能惩恶,又能开其自新之路。司马迁的《史记》真正做到了爱不掩过,恶不损功,实事求是,功过分明,所以苏洵给予了很高评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洵在论述《史记》“隐而彰”的特点时所说的“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这一番话,已经第一次接触到了司马迁写人叙事运用了互见法的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史记》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著作,但司马迁在如实地反映客观历史情况时,不是只作纯客观的描

述,而是通过对史料的精心剪裁和合理安排,从而表现出作者的爱憎褒贬感情。对于作者竭力肯定颂扬的人物,司马迁常常在其本传中详记其历史功绩,至于这些人物的缺点、错误等等不足之处,则在其他相关的传中予以披露,他写廉颇、郾食其是这样,写项羽、信陵君等人也是这样。苏洵在历史上首先对司马迁用互见法组织历史材料的做法做出了肯定,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虽然《史记》中运用互见法的情况比这更复杂,好处更多,苏洵至多只谈到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可是他的发明对后人启发甚多,明清以来,人们对《史记》互见法的认识逐渐深比,时至今日,张大可先生说:“司马迁熟练地运用互见法,最经济地组织了历史素材,巧妙地塑造了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而又保持了历史的真实。互见法把自成单元的一百三十篇《史记》文章紧紧地联结起来成为浑然一体的艺术品。可以说,研究《史记》互见法的运用,是探讨司马迁‘一家之言’的一把钥匙。”通过互见法,可窥视司马迁一家之言的奥秘,说明苏洵发明互见法的意义是相当大的。

《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人对它的推崇之高,几乎无以复加,而三苏却认为《史记》远非尽善尽美。他们一方面对《史记》有所肯定、赞扬,一方面又对《史记》做出了严肃的批评。苏洵曾称颂《史记》文章“淳健简直,足称一家”,可又指责司马迁“裂取六经传记杂于其闻”,是“破碎汨乱其体”。他认为《尚书》《左传》《国语》之文不是不好,把它们夹杂在《史记》文章之中就“不善”了。(苏洵《史论》下)苏洵的这个看法,和明清以来的《史记》评论者的观点有较大距离。如清人包世臣说:“《史记》点窜《内·外传》《战国策》诸书,遂如己出。”(《艺舟双楫》卷一《与杨季子论文书》)牛运震也说,《周本纪》“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云云,此与今所传《泰誓》下篇词旨略同,足证孔安国《古文尚书》太史公未尝不见也,乃于原文字句略加点窜,便古雅绝伦”。又说《齐世家》“叙崔杼弑庄公及晏子佐景公数段,较左氏文俱节简,而一二点染,增润处又极有精彩”。(《史记评注》)近人李景星也说,《周本纪》“前叙周家世德,约《诗》《书》之旨,融合无迹。共和以来,多采《左传》《国语》《国策》之文,或备录其全,或节采其要,典雅奇肆,无美不俱”。又说:“夫太史公作《五帝纪》等篇,皆采《诗》《书》传记以成文,论者以为一经点窜,便成《史记》笔墨。《礼》《乐》书,亦何独不然!”(《史记评议》)

明清以来的学者认为,司马迁采用先秦典籍的文字,是经过加工改造的,经他的妙笔点缀润饰后,有的似锦上添花,更出色了,有的则和《史记》文字浑然一体,完全是一派太史公笔墨了,因此,苏洵的指责是值得商榷的。

继苏洵之后,苏辙在《古史序》中对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的贡献做了肯定,说“太史公始易编年之法,为本纪、世家、列传,记五帝三王以来,后世莫能易之”。接着他却批评司马迁道:“然其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汉景、武之间,《尚书古文》《诗毛氏》《春秋左氏》,皆不立于学官,世能读之者少,故其记尧舜三代之事,皆不得圣人之意。战国之际,诸子辩士各自著书,或增损古事以自信一时之说,迁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传之语,以易古文旧说。及秦焚书,战国之史不传于民间,秦恶其议己也,焚之略尽,幸而野史一二存者,迁亦未暇详也,故其记战国,有数年不书一事者,余窃悲之。”因为“司马迁作《史记》,记五帝三代,不务推本《诗》《书》《春秋》,而以世俗杂说乱之,记战国事多断缺不完”,所以苏辙特意作了一部《古史》,以补《史记》之不足。苏辙的这个评论问题很多,且言不切实,其说司马迁“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未免指责太苛,难服人心。实际上司马迁知识渊博,读书很多,举凡《诗》《书》《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以及诸子百家之书和《牒记》《春秋历谱牒》《秦记》《列封》《功令》等等,他都熟烂于胸,并不陌生。在《史记》中,记载了司马迁所见书共一百零三种,其中六经及训解书二十四种,诸子百家书五十二种,历史地理及汉室档案二十种,文学书七种,这仅仅是司马迁因事论及的一部分,其他没有被记载的恐怕更多,怎么能说司马迁“浅近而不学”呢?事实上,苏辙的《古史》更加不孚众望,适足以证明他的批评不切合实际。

另外,说司马迁“疏略而轻信”,也不符合实际情况。由于历史文献的不足等原因,《史记》中的舛误之处在所难免,说其“疏略”,还间或有之;可说司马迁“轻信”,那就大错特错了。司马迁处理历史材料的态度是最严谨的,这一点早已为古今中外的学者所承认。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也时有交代,或曰“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或曰“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或曰“疑则传疑”,“疑者阙焉”;或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说明司马迁对古史的考信原则,



韩柳文法祖《史记》研究

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明确的,说司马迁对历史材料是见什么就信什么,不加一点考订,没有什么取舍标准,这是没有根据的。苏辙的史识不够,所以对《史记》的批评没有击中要害。

在三苏中,苏轼对《史记》的责难比苏辙更厉害。他说:“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违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则司马迁之罪也。秦国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豹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筭之材,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而迁称之,曰‘不加赋而上用足’。”在历史上,商鞅变法和桑弘羊理财,曾益国利民,都是有进步意义的,司马迁在《史记》中都做了肯定,苏轼却指责司马迁这样做有罪,说明他的思想是比较保守的。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曾有较多的抵触情绪,连累而及,他把历史上的变法人物也一概否定了,这是不足取的。

总之,三苏对《史记》批评多于赞扬,而其批评每每偏颇、过激,说明他们对《史记》的认识,还有一个深化的过程。

其二,三苏读《史记》。三苏出生在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家庭,其家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对历史著作的研读,而《史记》和《汉书》又是他们读得最多的两部史书,甚至“其勤至手书司马氏《史记》、班氏《汉书》”(苏辙《伯父墓表》)。苏洵少不读书,年二十七始大发愤。他读书广泛,对《史记》也读得很认真,很细致,而且能好学深思,致疑发难,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史记·高祖本纪》记高祖病危时对吕后说:“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苏洵读到这里,就发生了疑问,说:“方是时,刘氏安矣,勃又将谁安耶?”他抓住这个疑问进行探索,认为“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属勃也,知有吕氏之祸也。虽然,其不去吕后,何也?势不可也。”既知日后吕后将作乱,为什么不先行除去呢?这又是一个疑问。“独计以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吕后佐帝定天下,为诸侯大臣素所畏服,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壮。故不去吕后者,为惠帝计也。”苏洵认为